

大姐您好

戈 扬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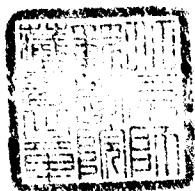
好 您 姐 大

戈 扬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24555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1024555

大姐您好

戈扬著

*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

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5 $\frac{1}{4}$ 字数110千字

1985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,000

书号: 10132·032 定价: 0.90元

目 录

前言	(1)
大姐，您好	(3)
未讲完的党课	(30)
钻石的光辉	(35)
自有清辉千古在	(39)
敌后荆榛仔细看	(57)

前 言

这里的几篇散文，是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以后写的。《敌后荆榛仔细看》，原计划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北、苏中、苏南和淮南等四个地区的敌后生活。谁知完成了苏北散记一部分，由于接手编务工作而中断了。迄今未能继续写下去，这笔账只好暂时欠着。其余数篇，也都是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和同志们的催促下赶写出来的。不免粗糙且有差错。所好的是文章发表以后，得到了同志们热情关注。比如《大姐，您好》一文，在《人物》杂志和《人民日报》刊出后，收到数十位同志的来信，指出“烟潍铁路”系“烟潍公路”之误。同志们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斥，除了一一订正之外，在这里向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。

鲁迅说：“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，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，常要觉得寝食不安，给它企图流布的。”（见《白莽作〈孩儿塔〉序》）他的这段话常在我的心中激起共鸣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祖国经历着巨变。在我所参与的一部分革命斗争的生活中，多少前辈和战友为革命贡献了生命，有的在十年动乱中遭受折磨致死致残，有的仍在继续战斗，但都已接近暮年。在那火红年代，难忘的日日夜夜里，他们的一

颦一笑，一言一动，依然历历在目。有的甚至深深地刻在我记忆的画卷中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。偶一回想，也真如捏着一团火，感到寝食不安，不写出来，总象是欠了一笔债似的。现在先将这几篇作为历史的剪影付印，得以时日，创造条件，将所欠债务逐一还清。我想，这是可以做到的，也是应该做到的。但还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，否则，是不可能的。

大姐，您好

一、“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？”

一个星期五的早晨，我刚刚迈进办公室的门，就听见电话铃响，真是巧极了。才八点刚过，是谁来的电话呢？一位陌生的男同志的声音，洪亮而庄重：“……我是邓颖超同志这里。邓大姐约你星期天上午九点半钟在家里会面。你知道地方吗？还是大姐过去住的老地方。……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是我早已盼望的啊！”我连忙回答。我一时控制不住的激动心情，是喜极的乐？是乐极的悲？总之，汇聚着这一切感情的声音，对方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
打电话的同志，和我未曾见过面。他的一句话——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，说到我的心里了。然而，我是怎样盼望的，盼望了多久，谁能知道呢？这，只能去问那奔腾的岁月，如火的年华，沉思的寒夜和重现的黎明了。是的，还是让我把这一片片历史的剪影，重温一遍吧！

一九七九年冬天。

我从内蒙古回到沈阳，又由沈阳回到北京不久，有幸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。

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代表并合影留念。在人民大会堂的摄影厅里，黑压压的人群，站在一层层高上去的铁架上，排成扇形。我站在扇形里面的第三层，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那关着的红格扇门。突然，随着门的开启，上千名文艺战士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中央领导同志精神焕发地鱼贯而入。十年大旱初见云霓，谁的眼眶里不是盈溢着欢欣的喜雨？我的双眼更是在透过雨帘寻觅着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我久已盼望见到的邓颖超大姐。

只见大姐走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。她那慈祥的笑容，明锐的目光，潇洒的步态，一如当年。尽管严酷的岁月在她的头上洒下了一层薄薄的银霜，眼角的鱼尾纹也已是密密麻麻的了，但却比我日夜想望、日夜想象中的大姐，更年轻多了。而且，过去在她身上不曾见过的那种老年人特有的熠熠神韵，又更增加了她的丰采。

大姐进来以后且不落座。她先是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大家鼓掌挥手，接着便和前排文艺界的老前辈们——她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问好。当年敬爱的周总理和文艺界同志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，体现在大姐身上，谁不感到亲切，谁的心里不是沉浸在一股暖流里。

啊，亲爱的大姐，我居然又能够看到你，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现在我和大姐相隔只有数米之遥，真恨不得扑到她的怀里倾诉一番！然而，强烈的灯光照在脸上，摄影师已经发出命令，请大家注视镜头。他们正在拍摄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。

我在自己的方寸之地笔直地站着，心潮起伏，浮想联翩。

我和大姐二十多年不见，这是怎样的二十多年啊！回想在河北山沟里喂猪的时候，在辽宁盘锦农场挖泥运土的时候，在内蒙古沙漠僵卧在雪地里的时候，还有，还有在一次次批斗会上低头、弯腰、“坐飞机”的时候……每逢这样的的时候，是一股什么力量支持着我经受考验的呢！我终于回来了，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。怎能不向大姐报告一声呢？

曲折的道路，坎坷的历程，令人很自然地有了一个想法，仿佛忧患是永远的，幸福是暂时的。既然幸福的时刻稍纵即逝，我又怎能不抓住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，去和大姐见一面呢？

摄影完毕，扇形松动，人们一步一步地往两边挪移，我却一“蹦”跳在地上，加快脚步，穿过人群，向前挤了过去。可是当我越过一位又一位老同志，奔到大姐面前，叫出一声“大姐”以后，便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。其实就连“大姐”这两个字也只是一种感觉，不但别人没有听到，连我自己也是压根儿没有听到的。

走廊里光线比较暗，大姐握着我的手，侧着头，仔细端详。她脸上的皱纹在微微颤动，皱纹里隐藏着惶惑和忧伤。真的，一个似曾相识的老太婆，半路上向她进行“袭击”，怎能不叫她感到突然，而又有所触动？幸而走在后面的周扬同志提醒了一句，大姐这才认出来：“啊，你是戈扬呀！”看着她那惊喜的神情，仿佛是说：“啊，你还活着呀！”

中央领导同志的脚步在前进，大姐的话被打断了，我慢慢地回到摄影厅。人们已经陆续走尽。我这才想起去寻找摄影前放在墙角的大衣。大衣口袋里有一封信。这是我写给大

姐的信。原以为不能单独见她，准备托服务员转交的。其实这样的信，二十多年来我不知写过多少封了，却是一封也没有寄出过。先前是不敢寄，这两年是不想寄。大姐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，日理万机，我怎能去打扰她呢。如今是不必寄了。今天已经见到大姐，说明这段历史已经结束。余下的，那就是扑打尽身上的尘土，迈向新的历史途程了。

二、“你的情况，大姐都知道。”

大约是一年以后吧。

有一天，我接到徐盈同志的一封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“我最近见到邓颖超大姐。请示工作以后，大姐谈起过去的同志，也谈起你。你的情况大姐都知道，叫我替她向你问好。”

我把信拿在手里，读了又读，想了又想，感到莫大的欣喜和安慰。我的情况大姐都知道，她是怎样知道的呢？大姐呵大姐，你真是我们大家的大姐。四十年过去了，你还和当年一样关心着我们，惦念着我们。你为我们的成长，曾经操过多少心啊！在那难忘的抗日战争年代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的重庆，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红星，你是我们这些女青年的最亲的亲人。是你扶着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，是你教给我们怎样运用手里的笔去和敌人作斗争的。记得我们这些女青年当时最亲密的耳话是：“小心大姐克你。”“噯，告诉你，大姐克我啦！”受了大姐的批评，有时是很严厉的批评，却反而象是吃了蜜糖一般甜在心里。

我是怎样认识大姐的呢？说起来话就长了。邓颖超这个

名字，是我学生时代参加秘密读书会时，在一本书里看到的。当时，我的心早被吸引到中国的别一世界去了。

到了抗日战争初期，我参加救亡活动到了武汉，住在旧日本租界，可巧的是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旧日本租界。那时候中国进步的女青年，谁不想见邓颖超一面啊！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，办事处一位同志通知我，下午三时在武昌召开“三八妇女节”纪念会，邓颖超大姐希望我去参加。可惜的是，我受阻未能去见大姐一面，这使我感到是最大的憾事。

一九四〇年春，我到了重庆，在“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”工作。邓颖超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，我这才在会议上见到大姐。那时我在联络组，我们经常召集各阶层妇女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。大姐每会必到，到必讲话，讲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义正辞严，令人折服。她的那些宣传鼓动性很强而又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演讲，打动了多少知识界妇女和青年的心啊！

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通青年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理想和幻想，正确的和错误的观念，加上生活上的矛盾，一时弄得我苦恼极了。我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来到化龙桥，第一次登上了红岩，在一座红砖楼房里，在大姐和周恩来同志的卧室里，大姐的那一双温柔而炽热的手，和一个女青年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她的坦率和热诚给了我多大的温暖呵！

那一天，大姐穿一件深色的旧旗袍，健美、朴素、大方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位三十六七岁的大姐，既有革命政治家的非凡的风度，又有一颗诚实而善良的心。而她的那一双慧眼，仿佛能看穿年轻人心里想的以及还没有理解的，以至还没有

意识到的一切。不用说，我的情况大姐都是知道的。

在窗前横放着的写字台两边，大姐和我面对面坐着，倾心交谈。

“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”这个团体虽然是宋美龄为会长，大部分机构为国民党所把持，却还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。那时候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共、防共、溶共，因而团结是表面的，斗争是实质性的。大姐从当时的斗争形势，和我所处的环境，谈到我对工作和生活应该采取的态度。有耐心的说服，有严厉的批评，虽然是初次谈心，每句话几乎都是单刀直入的。顿时，我的头脑清醒了，我的眼前明亮了，我知道我应当怎样走自己的路了。谈话结束，已近中午。大姐拿出一块带瓜子仁的圆形蛋糕，放在盘子里，用刀切成两半，我们各自吃了自己的一份。几十年来，每当想起我和大姐的初次会见，那块蛋糕的甜味，仿佛依然留在嘴边。

大姐工作和居住的地方，一是红岩嘴十三号，一是城里的曾家岩五十号。从那以后，我便经常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找她，不过每次去找她，总是在十分必要的时候。因为在她住地的周围，有无数双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在窥视着。我在找她以前，总是先把问题准备好，进门以后就在左手那间小会客室里的沙发上坐下，不用等，大姐会很快地出现。三言两语地把要说的话说完，得到明确的指示后起身就走，决不耽搁。去找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人很多，我和大姐的接触是秘密的，怎能让人碰见呢？

有一回，我刚推门进去，大姐便从会客室迎了出来，同时用右手带上背后的门，一边高声和我说话，一边示意我到

里面去。我知道会客室里有客人，便径直走进后院，上了一座小楼。

这是一座简陋的楼房，楼上有几个房间。一间朝阳的小屋就是周恩来同志和大姐在城里的卧室。临窗的长桌上铺着一块旧布，上面放着衣服、熨斗、剪刀之类的东西。我这才发现大姐还会做针线活儿。难道大姐还能抽出时间料理家务？我琢磨着。

大姐回来了，笑着说：“你来得不巧，差一点被人碰见。”原来会客室里的那位客人是我的一个同事，一位八面玲珑而政治情况不明的人物。她平时对我十分注意。我听了以后，心里着实吃了一惊，同时也暗暗钦佩大姐的精明和机警。

大姐拿起了桌上的针线活儿，是一件旧了的藏青色毛料男上衣，上面有一个窟窿，已经用原色的羊毛纤维织补好了。大姐将它摊在桌子上，喷水熨平，用指甲在上面刮了又刮。她又拿到亮处仔细地看，我也伸头仔细地看，织补得好极了，简直是天衣无缝。大姐高兴地说道：“看不出来了吧？这是恩来的礼服，他要穿着去会客哩！”

真没想到，中共中央副主席，赫赫有名的周恩来，会见中外人士穿的是一件织补过的礼服。更没想到大姐还有一手这样高超的手艺。她那手指的灵巧，动作的麻利，也是很少见的。我问她怎么学会这样好的针线活，她说：“只要是革命需要的都得学呀！”

谈完工作，大姐又说到由重庆去延安的同志，往往将自己日常穿的衣服留在办事处。办事处将它保存好，有从延安出来的同志要换装，便可以拣合身的穿。大姐说：“这样，也

可以省下不少钱哩。”

从此，我对大姐又加深了一层认识，她不但是一位妇女领袖、革命的政治家，还是一位料理“家务”的能手。在花钱这一点上，竟然是如此地精打细算，亲自操劳。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对我来说，不啻是上了革命的第一课。

三、“我欠你的账，一定要还的！”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间，我又一次幸运地见到了大姐。这是我回北京后的五年里，和大姐第二次握手见面。

那天，东方歌舞团在北京饭店举行二十周年纪念会，我听说大姐要来，便提前到会场等待。大厅里五光十色，一张张圆桌周围坐满了人，前面作为首长席的圆桌也将要坐满，节目即将开始，却不见大姐到来。

我选定一处坐下，无心吃桌上的糖果，一心一意地注视着南门入口处。突然，一阵骚动，人们往南门涌去，摄影记者们更是健步如飞。我知道定是大姐来了，便忙去迎接。大厅外面，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衣帽处，连插针的缝儿也没有，我只得站在台阶最上面的一级，踮起脚了望。

只见大姐在那里站着，由秘书赵炜同志帮助着脱去大衣和帽子。解下围巾以后，大姐的面容才露了出来。她脸色苍白，步履缓慢，由王昆同志扶着一步步走上台阶。她说话似乎很吃力，却大声地说道：“我这几天病了，你们叫我来，我不得不来，我这是奉命而来。”

啊，大姐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！照相机用的镁光在她的

全身、在她的周围照成一圈透明的银雾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银茧，茧的中间是一条春蚕，她的银丝是永远吐不尽的。一位革命者活着就是为了付出啊！我上前向大姐问了一声好，怕影响摄影，立即退出，回到座位上，等待大姐讲话。

大姐没有讲话。前来看望她的同志们络绎不绝。她和平时一样，和同志们一一握手交谈，问长问短。节目已经演了几个，人们并未留心精彩的节目，而是凝望着大姐。我等呀等呀，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隙，走了过去对大姐说：“大姐，我在你这里坐一会儿吧！”大姐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们的《新观察》，我过去都看的，现在眼力不好，字又太小，不能全看了。”我又喜又惊，喜的是大姐已八十高龄，精力竟然如此充沛，连这样一本小小的杂志都关心到。惊的是大姐的讯息竟是如此灵通，居然能准确地知道我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。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呵，怎样向大姐交代呢？大姐继续说：“我早就想约你到我那里去，总也没有实现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一群年轻的女演员，如同鲜花一般一朵朵开放在大姐周围，要求合影留念。一群年轻的男演员如同雄鹰一般，又在展翅向大姐扑来。我闪在一旁，欣赏这一幅幅美丽的图画。我想，曾经有一根线将大姐的心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如今，这根线又将大姐的心和年轻一代人的心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间，在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，我又一次见到了大姐。这一回，和我上回见到的大姐完全不一样了。她脸色红润，神采奕奕，穿一身浅茄色西服，

白衬衫，齐耳的短发闪着亮光。她代表党中央向妇代会致贺词，号召全国各族妇女加倍努力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，为建设两个文明贡献出最大的力量。那清晰的字眼，色彩丰富的声调，热情而深沉的语言，响彻人民大会堂的每个角落，渗透到每个代表的心里，使人们沉浸在深深的思索和大展宏图的激情之中。这时候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我们的祖国仿佛是一艘航行在大洋上的巨舰，舵舱中的前辈革命家们正在率领男女健儿破浪前进。

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在妇代会的闭幕式上。大姐和往常一样，安详地坐在主席台的前排。我隔着台前的花丛仰脸凝视着大姐，大姐却侧着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全国妇联新上任的第一书记张帼英同志。张帼英坐在大姐的右面，和大姐隔着四个座位，正在麦克风前致闭幕词。她是这次妇代会选出来的一位接班人，四十七八岁年纪，短短的头发，深深的眼窝，一张广东人特有的精明强干的脸型，穿一件带点土气的浅蓝色单衫，看上去象个学生。我听人说过，这位全国妇联的新领导，是光着脚丫穿一双塑料鞋到妇联大楼来上任的，作风朴素，雷厉风行。她十五岁参加工作，当过县委书记和地委副书记。很显然，她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这个讲坛上来的。在她致闭幕词的长时间中，大姐始终侧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，那精神是如此的专注，如此的炽烈，如此的动情，如此的令人神往啊！我看着大姐，从她的眼神里仿佛读到了一部中国革命史，一部妇女运动史，一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一代新人寄托了多么深厚的期望啊！我有幸看到这样一个

伟大而生动的场面，心情激动不已。瞧，一朵新的火苗，不，无数朵新的火苗，正在从老一辈的手中接过火炬，去开创新局面，去点燃新的世纪的火……

妇代会结束后，又是在摄影厅，又是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代表们的幸福时刻，大姐步履轻捷地走过我的面前。没有想到，她居然在人群里一眼看出了我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她握着我的手说出一句使我吃惊的话：“戈扬呀，我欠你的账。”我还没有醒悟过来，她已经走过去了。可是他走出两步，却又回过头来重复道：“我欠你的账，一定要还的！”

大姐欠我的账？这是从哪儿说起呢？啊，这是指前次见面，她说过要约我到她家里去还没有实现吧！然而，回想我的一生，如果说是大姐欠我的账，莫如说是我欠大姐的账，欠党的账呵！于是，四十年前的大姐，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……

一九四一年年初，“皖南事变”发生了。风云变幻的重庆，政治空气立即紧张起来。绿色土纸印的《新华日报》上，出现了周恩来同志写的十六个字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？”不几天，消息传来，××被捕了，×××被捕了。白色恐怖笼罩山城。

那天早晨，我走在张家花园的路上，一眼瞥见大姐和张晓梅同志迎面过来，她俩脸色深沉，走在路的左边，我走在路的右边。将要接近，大姐继续走下去，晓梅却一步斜了过来。幸好路上无人，她在我的耳边说了几句要紧的话：“你的名字在黑名单上。明天一早来五十号，脱掉身上这件红毛衣。”

我心头一震。啊，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伸向我了。不过，